

论转型期亲子互动的特征

田 晓 虹

本文以实证调查为依据,从已婚两代人的居住形态、经济往来、家务依赖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分析了两代人之间的互动乃至家庭关系的特征,以展示处于历史性变革中家庭人际关系的现状与演变过程。

作者:田晓虹,女,1953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将要探讨的是同一世系中已婚两代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试图将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互动内容乃至互动心理溶于社会变动、历史变迁的大潮之中加以冲洗、显影,以使其特征更为清晰,演变过程更具层次。在此所引用的数据为1993年春夏之交,《七城市婚姻家庭研究》课题上海分课题组以分域多阶段概率抽样法对上海市十个区800户家庭中已婚夫妇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并参照近年来其它有关家庭的调查资料。

一、居住意向与实态存在落差

西方社会的价值观认为:子女18岁前属于家庭,18岁后属于社会。尤其子女婚后一般均另立门户,两代人作为各自独立家庭的成员,经济上互不来往,生活上各理其事。因此,在他们的生命周期内所经历的居住形态一般为:核心家庭(出生至成年)→单身式夫妇家庭(独身或结婚)→核心家庭(子女出生)→夫妇家庭(子女成人)。独立的生存意识决定了对居住形态的选择,而从中不难看出代际依存的淡薄。即使垂暮老人也没有期待子女赡养、孝敬的欲念,哪怕境遇窘困的单身汉,也不抱有依靠父母资助照应的企盼。这样的家庭观念与个人主义和爱情至上的价值观不无天然的联系。而在东方文化的熏陶之下,中国社会传统的家庭伦理,要求人们从呱呱落地直至白发苍苍,都属于父母、属于子女、属于家庭共同体。其生命周期内的居住形态为直系家庭(出生至结婚)→直系或核心家庭(子女出生)→直系家庭(子女结婚)。纵向的亲子互动结构贯穿整个人生。当然,解放以来,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以及社会的开放、经济的发展,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逐渐取代了家长专制的亲子关系,人们的家庭观念及亲属互动模式也在走出传统的樊篱,由纵向的亲子一体向横向的夫妻核心转化。从家庭居住形态看,已婚子女应与父母分开居住的价值取向已被广泛认同,早在1987年的抽样调查中,就有63%的市民(包括各年龄层的已婚夫妇)表示了上述意向。^①但是,由于住房紧张、交通不便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使居住形态的不可选择性成份大大增强。因此居住意向与居住现状的分离为当前社会转型期市民居住状况的一大特征,它表明经济发展的客观水平相对于人们主观愿望和要求的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1987年对上海市区500对夫妻的抽样调查。

滞后现象。

在对不同年龄层的居住形态的分割观察中,更能发现居处选择上的主客观落差。数据表明,36~45岁的年龄层居住在核心家庭中的比率最高(71.3%);以下依次为35岁以下(59.0%);46~60岁(42.9%);61岁以上(8.5%)。本次调查还告诉我们,目前子女的经济收入明显高于父母辈,而且未婚者明显高于已婚者。市场经济使年轻人在就业机会和经济待遇上占有优势,它使老少两代的收入分化在所难免。与此同时,在消费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代沟”显而易见。这使得年轻人结婚后与父母共同居住日趋呈现难度。那么,婚后的子女独立门户的高峰为何出现在婚后的第10年至20年之际,而不在结婚即后呢?这无疑与现行的住房制度有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住房分配制度,实行在同等的条件下以工龄、资历职位决定分房的次序。35岁以下的年轻人,参加工作时间尚短,事业上大多还无甚建树,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单位暂且不会考虑分配住房。所以他们中的1/3婚后或从夫居或从妻居生活在直系家庭中,其所占比重为36~45岁年龄层的近一倍;核心家庭率则要低12.3个百分点。当进入婚后第2个十年,即年龄在36~45岁的中青年,他们的孩子已进入小学或中学,孩子的成长伴随着对生活空间扩大的需求,加之同居的老人基本已到双双退休的年龄,对下一代及第三代的照料帮助也进高峰,不乏萌生享受清闲的愿望,原有的住房日显窘迫,家庭人际关系的摩擦和隔阂也到了频发阶段,这些实际困难均可列入申请分房的首要条件。其次,人近中年,相当的工作经历逐渐使其成为单位的中坚和骨干,他们的成就和贡献,无疑成为分得住房的充分条件。因此,中青年年龄层的核心家庭率高居各年龄层的榜首,成为当代中国城市家庭居住形态的代表模式和主流,它与这一年龄层正处于事业有成,家庭安定,精力充沛的社会角色是相吻合的。而46岁以后的年龄层,核心家庭率明显下降,可以认为它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制约,其一父母进入高龄,日常生活及病痛等需要照料,在以家庭养老为主的现行条件下,随着对上代的扶助、照顾负担的加重,分开居住显然难以应付,共同生活则更为合理。其二50岁以后的年龄层,随着子女的成家,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空巢”家庭的盟员,夫妇家庭的比率为13.6%仅次于老年年龄层。综上所述,居住形态的峰谷曲线,在与生命周期的变化密切相关之外,仍相当程度地受到现行住房制度的制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住房商品化的推行,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会减弱,对居住形态的选择会更贴近主观意愿,而人们的自我资源将越来越成为居住自由度的主导因素。

二、经济依存向亲方倾斜

几十年来,社会主义的退休金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使“反哺”式的经济赡养已一改前态,老年人在经济上依靠子女日渐稀少。本次调查显示,只有28.7%的子女向老人提供赡养费,而提供者主要以46~60岁的年龄层为主,占总数的48.8%。随着年龄的降低,供养者的比重依次递减,36~45岁的为25%,35岁以下者不足15%。供养金额为平均每月33元,以调查当年的物价指数衡量,最多只能作为生活补贴而已。不难发现,需要子女供养的亲代主要为高龄老人,他们大多为改革开放之前的退休人员,退休工资偏低,尤其女性老人中尚有部分终身无职的家庭妇女。与此杯水车薪的经济赡养相比,亲代向子代提供的经济援助(指子代已参加工作,有独立经济收入者)则可谓倾其所有,无私奉献。尤其在子代结婚、生育、抚养子女等消费上,依靠父母已成风气。据一项对上海地区1995年结婚费用的调查,有90%以上的青年男女

结婚时得到父母的资助,其数额在1万元至10万元不等。^①除这种一次性的巨额资助外,日常生活中子代对亲代的盘剥仍较普遍。本次调查中,有2/3的直系家庭的日常开支由亲代掌管,其中子代年龄在35岁以下的占40%。而在这些共同生活的直系家庭中,有一半以上的子代上交的生活费不足开支,其差额当然只能由亲方填补。此种现象虽然与日趋明显的老人收入分化不相谐调,但是,行为的生成除了以现实的社会价值为背景外,以往的生活经验和积累所留下的印痕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在作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制度以及由此发生的亲子经济互动模式,则与当前的行为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的分配制度,经济发展的迟缓使知识贬值,年龄则成为财富,人们的收入只与工龄成正比,一个60岁老工人的工资肯定高于40岁的工程师。以年龄为等级的社会分配方式造成经济状况的代际落差。此外,文革十年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处于瘫痪状态,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即使留城的中学毕业生也大多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低层次职业。这一代人的学历、职业地位以及颠沛流离的经历决定了他们难堪的经济境况:上山下乡的靠父母补贴生活费;回城上学的仍靠父母供养;结婚成家更离不开父母资助费用、提供住房……。政治动乱导致社会秩序、生活秩序颠倒,个人生命周期与社会角色、家庭角色错位,身处乱世的青年尽管完成了心理上的“断乳”,却迟迟无法实现经济上的自立。而立之年难立,不惑之年多惑。代际互动中子代经济上的“侏儒症”现今虽已时过境迁,但由于长年的延续和心理积淀,仍具定势效应,故至今余音缭绕。另一方面,亲子互动是出自双方的行为,有子方的“依”,必有亲方的“愿”,那么亲方是出于何种心态而甘愿被“啃”被“刮”呢?当生活水平只能维持温饱状态时,当社会动乱使家庭生活遭受劫难时,处于艰难生存环境下的家庭成员往往不仅在情感上,而且在经济上、生活上都特别互相依存,互为支柱。它又是家庭共同体意识不断巩固的温床,人们对家庭的安危及荣耀的关注会超过对个人价值——追求的欲望。另外,在老年人的价值取向中,传统的家富荫及子孙,子贵光宗耀祖的家庭观仍占相当席位。那些甘愿为子孙的幸福作出最后奉献的长辈们离退休后再就业,除了寻求自身的充实感和经济上的宽裕外,希望提高收入以馈子孙的大有人在,此愿的多层次组合为:一求子贵父荣,子女结婚有排场,家居多电器,衣着打扮入时气派等阔绰的表现亲方一大荣耀,子女能够实现自己未能如愿的“梦想”可谓欣慰不已;二盼家庭和睦,一般经济上满足了子女“啃刮”欲望的,可以换取子代满足某种虚荣心的心理平衡,从而求得家中相安无事、皆大欢喜,即用钱买一个“太平”;三望来日有靠,一旦日后年老体衰,子女念着父母的深情厚意,可以照顾得尽心一些,回报率更高一些。

亲子间的经济关系既然离不开历史、社会因素的投影,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进步,这种互动行为可望更为自主平等,而且富有东方人情味。尤其随着科技进步和知识更新的加速,年长优势正逐渐失去,而代之以谁更容易吸收新知识,拥有新技能便具有实力和资源。这种转变无疑有利于年青一代,并使下代在知识、职业地位及经济所得上完全可与上代争雄并实现超越。随着子代社会地位和社会责任的提高,他们的家庭责任感和主体意识必然同步上升。一旦经济上相对处于弱势的亲代需要支援、扶助甚至赡养时,经济依存的重心有可能倾向子方,至少在道德上它会被广泛认同。

^① 解放日报1995年关于结婚费用的有关调查。

三、家务依赖向自理转移

前述 35 岁以下年龄层的子代与父母的同住率高于 36~45 岁的中青年的主要原因在于住房所限, 家务上对亲代的依赖也不失为现实的需要。这一层次的夫妇婚龄不超过 10 年, 对独立生活缺乏经验和自信, 而且孩子尚在幼年, 正处于最为辛苦的哺育抚养期。同时, 工作上他们还处于角色起动阶段, 需要学习业务, 提高能力, 创造业绩。面对家庭、职业双重负担的压力, 父母的一臂之力则是最可依赖的后盾。本次调查也发现, 子代在 35 岁以下的直系家庭中, 有 43.1% 的家庭的日常开支由亲代支配(而中青年年龄层仅为 23%), 这意味着年轻的已婚子代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家务上仍然依赖着劳动能力尚可, 经济收入不薄的低龄老人。此外, 关于已婚子女与分居父母的接触频度, 经作多重交互分析发现, 在每天有走动的人群中, 与母亲(父亡)的接触远远超过与父亲(母亡)的接触。排除子女在感情上易与母亲沟通的因素, 从日常生活考虑, 男性老人无疑比擅长料理家务的女性老人更需援助, 而这一亲母疏父的现象恰恰说明由母亲带领孩子, 或搭伙在娘家等家务劳动上的反依存关系。

已婚子女在家务劳动上对亲代的依赖, 不局限于两代同住家庭, 甚至还延伸至分住家庭, 这种过份的“粘连”关系似有过份, 然而它却具有中国特色。自从解放后妇女走出家庭普遍就业以来, 家务劳动社会化问题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始终无法充分实现, 于是人们从观念到行为逐步接受了由老人来填补这一社会服务滞后于就业模式的缺口。就以幼托服务为例, 几十年来政府在人员培养和资金投入以及普及化上颇费功夫, 但至今仍有 1/4 的调查对象认为由自己的父母来照顾孩子最为理想,^① 可见这种依赖的定势之根深蒂固。然而, 我们终于高兴地发现, 长期以来的家务承担模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它首先取决于亲代尤其是母亲一代的素质改变。本调查显示, 近 10 年来, 受访者的父母辈无收入者基本绝迹, 低收入的比率也明显减少。尤其女性老人在 10 年前还有 41.3% 的月收入不足 50 元, 而同期男性老人如此收入者仅为 5.8%。近 10 年来, 老年人月收入的男女差异显著缩小, 以为数最多的 100~300 元月收入为例, 男女两性的比率分别为 70.2% 和 57.9%。从文化程度上看, 近 10 年结婚的受访者的母亲和婆婆的学历在小学程度以上者已达 2/3, 而在六、七十年代还不到半数, 解放初仅为 1/5。由此可见, 过去亲代尤其是无职业、无文化、无收入的母亲为子女代理家务、带领孩子在一定程度上出于以相应的劳动付出补偿对子女的经济依存, 具有对等交换的义务性质。这种互补关系在住房紧张和年轻妇女不断进入社会的背景下, 得以长期存在延续。而随着老年妇女自身素质的变化, 她们的自我意识在提高, 除在居住意向上要求独立外, 即使生活在直系家庭中, 她们的自我角色认知也发生了瞩目的变化。从三代以上同住家庭中家务劳动承担状况看, 家庭成员的目前参与率与受访者结婚时相比, 所有的成人家庭成员都呈增长态势, 唯有母亲们的承担量在减少。尤其最为繁重且花时间最多的买菜、做饭两项(除子代为 35 岁以下者)均从以母亲为主转移到以子代妻子或子代夫妻为主承担。可以认为, 老年妇女义不容辞地承担主要家务劳动的时代业已结束, 她们在家庭中的位置乃至老后生活设计, 正在摆脱传统的“依附”角色, 而向“自主”角色转移。她们正在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生活方式。

^① 香港岭南学院 1994 年对京、沪、穗三城市两代人关系的抽样调查。

四、独立与互助共存的趋势

今天,我们确已看到亲子双方的独立意识都在强化,家庭关系的轴心也由亲子一体向夫妻核心转移,那么老少两代人之间的包容和依存必然日渐松散,家庭趋向小型化、核心化也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但是,现有的住房条件,社会福利及社会服务水平,浓淡相交的传统文化和生活背景的积淀,仍将使两代人的互动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呈现多元的、若即若离的态势。三代以上同住家庭的内部裂度,显现了这种趋势的端倪。本次调查中,三代以上家庭的经济支配权和家政实权,正在从亲代向子代过渡,尤其35岁以上的子代基本都大权在握。此外,同住分食的“一户两制”也在推行之中。即共住一个屋檐下,但经济生活基本分离,老少两代各做自家饭,各理自家财。此种外联内分的生活样式虽带有较重的理性色彩,有失家庭温情。但基于亲子双方主体意识日益增强,与其委屈求全,不如开诚布公,各得其所。这种在居住意向与实态难以统一的特定条件下的新型模式,既能部分实现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生活方式独立,经济支配自主以及家务劳动分理,又不失互相照应、互通有无。此种内部分化的形式在目前上海的直系、联合家庭中约占1/3左右的比重。它虽然只是一个局部现象,却是亲子互动中“有分有合”“以分求合”心态的具体表现,更可窥见家庭关系结构变化的趋向。可以预测,在住房条件、交通状况以及经济所得不断改善的情况下,近居分食将成为理想的亲子居住模式,既就近居住,各理家事,各自拥有独立空间和时间支配权,但又保持密切往来,包括照应第三代,护理高龄老人,并更加重视精神关怀、信息传递及天伦之乐享受。随着新建住宅的成片崛起,成千上万的市民正在告别旧居,迁入新房,相信亲子之间的互动一定会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形成新的时代模式。

责任编辑:谭 深